

大學的民主化

黃炳勳

雖然我不贊成你的意見，但是我會 拚老命維護你說話的權利。

——伏爾泰

（前言）在以色列的內格瓦沙漠，其中有一個名叫史特柏克的區域，賓古龍先生想在此處建立一個大學城，供做此文化沙漠開發之用。這座大學城將可容納一萬名大學生與若干的教授，藉由它的開發使得以色列的年輕人能夠獲得必要的自然科學知識與技術。它的理想乃是為了儲備專業人員，供做將來沙漠工業之用。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此類工業對企業家而言，只需要高度科技知識與少量原料。

這條新聞 1967年 1月11日刊載在西德法蘭克福的大眾日報上，如果沒有進一步的訊息，我們可以將大學功能定義為“一個在幾乎不可能到達的地方，亦能作為從事工業發展的制器”。從最原始的工業生產，到引進最先進的科技，對未來以色列而言，這將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計畫，而對我們而言，“大學是沙漠區域工業化的先驅”，此觀念非比尋常。然而，以色列的這個例子並非十分的不可思議，在我們的教育機構中，事實上也具有滿足社會勞動系統的使命。

大學功能之一是技術的傳遞已開發的知識。換句話說，他們必須滿足工業社會所需要的新生一代，同時必須關心到教育本身的膨脹問題。而除此之外，大學並且能夠產

生知識，包括將研究而得的訊息迅速傳達到軍備、社會方面的應用，和作為行政、管理等的輔助方面的策略知識，如此藉由指導與研究，使得大學能馬上與經濟過程中所必須的功能緊密連接。此外，大學功能被認為至少負有下列責任。

首先，大學員有確保大學畢業生都有大學功能領域外的能力，這種能力是指他們能對專業性職業性追求的本性與態度，並不包括全部的專業知識與技術而言。如法官被認為是有能力充分運用政府賦予權力，而醫生能夠對於不明確狀況立即的行動反應。當然，大學本身並無此能力產生專業的經驗。但在它社會化的過程中，至少要與這些能力的培養發生共鳴，否則，衝突將是無法避免的，我們只要回想到波曼中學的學潮，即可了解上述的含義了。說而言之，這些抗議以及學潮的問題，並非出於學校功能是可以確定的。

再者，大學功能之一乃在於傳遞、轉譯與發展社會的文化傳統。社會科學與文學的轉譯對大家整體性的自我了解，其功用是顯而易見的。而在今日，就如詮釋聖經這種需要嚴謹方法訓練的學問都無法逃避它的影響，其影響可見一般了。在歷史學家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起源的討論，

與舒坎特·麥
進分子能佔
最後，
計數的，但
的政治良知
成的良知意
對政府當局
變有所批判
性研究與政
生本身政洋
生，有著表
社會上，竟
然非政治性
知識的紀
如此。而
所產生的
術的領導
，對大學
，就我們
結構性變
不再需要
目標，而
培養民

「...
擱在
好了

與舒坎特·費拉格先生 (Suhrkamp Verlag) 這種激進分子能佔據現代德國大學的教席，皆是明證。

最後，大學功能及所能完成的任務，實是廣泛而唯以計數的，但我們仍可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它能夠喚起學生的政治良知，有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在德國的大學裡所形成的良知識並非政治性的，而是來自文化的內在本質與對政府當局忠誠的奇特組合。這類的良知是無法對政治演變有所批判的。對於政治科學在缺乏計畫性行動、系統性研究與政治性教育，而學生對於現今政治的過問權及學生本身政治權亦欠缺的情況下，產生了一群大學教育的學生，有著表面上的階級觀念心理，而這種階級觀念反映在社會上，就是一個相當整齊劃一的社會。當然，在這種顯然非政治機構保護之下，這一代的學生被教育成祇會恪遵知識的紀律，而無可避免地他們在做政治方面的表現亦是如此。而在傳遞不同學術功能與專業訓練的這個大學宗旨所產生的觀念中，使得接受大學教育的菁英份子深信，學術的領導地位能使德國在 1945 年大戰後重建信心。可是，對大學本身而言，這個傳統無法對抗法西斯主義的餘灰，就我們所知，往昔受大家認同的學術階級已與長時間下結構性變動的社會脫離關係，這是否意味著今日的大學已不再需要負擔政治教育的責任？或者他們的注意轉向其他目標，而不在需要負起政治教育與社會之間的聯繫？

培養民主精神由學校著眼



「……到了最後，」大宗教審判官說：「他們將會把自由擱在我們的腳下說：儘管奴隸我們吧！祇要讓我們吃飽就好了。」

杜思妥也夫斯基「卡拉瑪助夫兄弟們」

將沙漠中的大學設計為工業發展重心的例子，給予我們一種看法，難道今日研究與教學的功能僅限於生產與傳遞技術性已開發的知識嗎？今日的大學是否畫地自限於社會上需要的功能而已呢？而且是否至多只傳授浩瀚知識領域中傳統文化此一狹隘部分而已呢？我必須特別指出的一點是，不論在任何情況下，大學除了傳遞與生產技術性已開發的知識外，還包括前述三項重要任務，大學程度的知識不僅影響學生及大眾行為的導向，甚至使得理性的活動與社會關係無法被侷限在技術層面上。無可避免地，大學直接與這些活動發生關連並有直接參與，然而一個理性化的大學，不僅會影響文化的自省，並且能夠在不知不覺中影響社會的標準，如果設立大學的目的，只是為適應工業社會的需要，而放棄了原有古老的型式——自由，那麼它在高效率努力的背後，所呈現出來的意識型態，其功效充其量只不過與傳統大學不相上下罷了。事實上，大學可藉由穩定的、內蘊的專業標準、文化標準與政治良知的力量，而獲得報償，當這些力量從現有習慣特質而產生轉變時，甚至可以擴張到無法控制的地步。

在 1945 年以後，西德的大學教育主要目標，乃針對通才教育而設定。而且學術機構中更強烈包含了新人類主義思想，目的在於教育大學生，使他們適應於新的民主規範。在基本的通識教育課程，很容易與政治教育發生關連，而在學生團體裡充滿討論政局時勢的風氣，在學校社團中政治社團也廣受歡迎，不管這些訊息是否意味著政治教育已獲得正式的承諾，至少能使學生們參與政治活動，概括而言，當大學不能藉由它傳統的自我認知方面的政治擴張而融入民主社會時，它將永遠停滯不前。唯一不變的是，為防止危機產生而建立的自主權，它的附屬產物當然是它的不動性，造成的結果會使得政策的制定缺乏彈性，並且對於自發性的大學改革構成嚴重威脅。這也就是為何在隔第一次世界大戰二十年後的今天，有改革計畫了。

在這種情況下，那些為了保存德國大學的傳統的教授正面臨著改革的衝擊、矛盾與衝突。他們必須接受文教會推薦所謂最新資料，事實上這只不過是為了適應潮流而接納技術性思想的一種策略，而後他們必須犧牲聖化了的基本

本傳統，忍受著伴隨改革而至的規範，而保全他們大學教授的地位；或他們在不顧行政當局的壓力下，要求縮短研究課程，而與所謂前衛人士聯合。由此，我認為要使一所大學能開明而且邁向民主化是需要經過內部改革的陣痛期，並且需要付出代價的。

戰後的民主與傳統大學之間的關係已逐漸式微，有兩派完全不同的學說，說明它們之間的關係。一派主張大學改革的唯一目標乃是為提高生產力，將沒有政治色彩的大學融於社會的勞動中，並且同時運用巧妙的手腕斷絕與政治的任何關係。易言之，即斷絕與大眾之間的關係。另一派主張將大學融於民主體制當中。後者似乎是唯一可行之路。它或可稱之為“大學的民主化”，我喜歡將我的贊同票給予後者，我用以下所述來說明大學知識與民主型的抉擇標準，其內在關係與親和力的程度。我在前面一開始所主張的論點，是引用自科學的哲理，從傳統上對於科學性探討的自省。休美先生（Hume）他主張，正確而標準的論點並非源於習慣上的論點。因此，最好不要對道德、政治或有關實驗科學的問題妄下定論。換言之，我們不應該只是追求標準性的選擇，從理論性知識的觀念而言，我們最多只能對為特定目的而設計的儀器行行使功能訂定一些規則如此而已。而在應用知識上，則包括了有關直接活動的規則。而這些標準，並非基於科學知識的結合所造成的。

我們不須在邏輯推理所產生的理論外，去另外了解其他科學是否也是需要，如果我們想像，我們所需要的是過程而非結果時，將會有另一種情況產生。因此，我們可利用變質理論的討論——利用不同的方法學達成豐碩的成果理論的基礎理論。有趣的是，從邏輯學上的觀點而言，這些問題的討論與其他應用問題方面的正式討論，實際上將是特殊同歸，變異理論的討論與直接推論或實際控制的互別，在於它藉由標準選擇的正常化，使得研究態度更趨於理性化。

誠然，態度與陳述之間的關係，並不意味著他們相同。然而，一個程序的贊同或者一個標準的被接受，可能會受到爭論的影響而有所起伏，但是最少它能夠接受理性的

評估。而這正是嚴密思考的重要任務，它包括了多重理論或者是實際上的決定。當然，就科學的觀點而言，我們所討論的敘述性的架構標準，與直接行動的規則標準是有區別的，但實際上，二者皆是不受束縛而能討論理性機會選擇的例子。在實際的應用中，很少有例子能被運用在此理性的規範，在政治上却可以。有種政治上的決定的形式是依據所有的抉擇，假定在場討論的人一致同意並無受到外在壓力而達成的結果，這就是民主的特色，在此特別聲明的是，公眾集會的討論被認為是除非能夠提出更好的意見，否則無法被接受，而大眾他們個別的意見，被認為是沒有壓迫性的，一致同意的一個替代品，這個原理表現在坎特庭形式（Kantian manner）就是“有理走遍天下”。它連繫著政策決定的民主形式與科學方式的討論型態。在此，我們看到了學理與應用理論的結合，而今天我們能做的只是正式的關注此一結合，而我仍無法闡釋它的內容的哲學理論。

在科學方面，今日哲學已不再有往昔慣例上的特權保障，但哲學化對於形式上屬自我反省的科學領域本身仍保持著普通恒久的力量，它被定義為特殊訓練的哲學本身，能由假設為在特殊而又狹窄的學科領域中闡釋，而且合法的超越為它保留的那個範圍。因此，我以為當醫生們從社會學、精神分析學的研究中意識到家庭環境對精神病患產生的影響，並且由此學到了如何以他們傳統訓練來思考某些生物學上的假說，事實上已發現了哲學的曙光。哲學的曙光並非顯現在規則、訓練之間鑽牛角尖，而是它能闡揚科學的自省的重要性。因此，使科學對於他們自身的預先假定能更為嚴謹而臻於完備，如此，恒久的哲學化並且對科學結果與現實生活中的互換性效果，獲得正面的肯定。科學物質融入學生的教育過程，是需要哲學良知的自省的配合才行，對於以專科課程為導向的新教學法，其開發者應能了解本身對於不同研究領域的認識，才能勝任之。

例如，在小學程度的語言基礎、文法教育，在那兒，許多的語言同時密集而且比較式的傳授給小學生時，就會發現語言哲學的內涵與課程深度無法兼顧的問題。類似地，在國中程度的歷史教育，其教學方法的問題導致十七世

從我們這個時代開始，也許新的教育理論變得流行、時髦，但是在我們的印象中，學習過程仍是：教育的目的在於傳布，而非窒息各種意見與看法。意見必須從所有人的專制管理中解放出來，不管這些人穿的是研究員、法官或是教育行政單位中一員的服裝。

Irving Goldberg 美國上訴法院法官
（在 Shanley Case 1972）

紀末葉歷史上哲學傳統意識的覺醒。同樣重要的是自然科學及數學產生的教學方法上的自省需要，我們在下述的例子裡，可以看到理論與實際訓練在應用時所造成的自省：在法理學上，法律應用的執行，導致聖經詮釋學的問題，它會顯現出應用科學自省的特質，在這個領域內，他們嚴格的對自己負責，在大學裡，這個領域的大門，絕不可以被關閉，因為唯有在此，才能以理性的方式實踐大學能產生並且傳遞技術性的知識與已開發知識的這些功能，並且唯有藉由大學畢業生回饋的關係，才能達到提升傳統上職業倫理進入他們的專業執行中，也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將新生代的觀念帶到文化傳統，使文化傳統變得活躍，並且藉由沈思的方法找回原有的良知，否則，整個文化的運轉將變成呆滯生硬，更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將政治的演變，與大學之所以成爲一個科學機構與社會團體的原因，納入實際的討論中，而學生在研究過程的參與，基本上已包括了科學自省的參與，但是如果這類的討論是在綜合性的、理性規範的範疇內，則此討論尚未結束，因為理論與實際的分歸仍無法找出，在實際應用問題的討論：激烈的爭論，其最後結果祇是結束了基本方法學上的假定與行爲導向的自我了解。

因此，只要我們不想武斷的使理性活動停止，就不需要刻意在大學裡專門針對專門化、專業化、與外在大眾化對立的這類問題，同樣的，無論如何，我們不會滿足於一個缺乏政治理念的校園。近代政治學必須成爲校園裡內在社區的一分子。而法蘭克福大學內所成立的國家民主俱樂部（一個親新納粹的石翼團體）就是很好的例證之一。而我相信這些理論有其可行性，因為要使校園內政治言論自由的合法化，其唯一信念就是抉擇下的民主型式，可以給予自由選擇機會，易言之，用這種方式的理性抉擇是基於不受控制的情況下，自由討論所產生的共識才能達成。一個理念是有束縛性的，但它並非真實的存在，這就是爲什麼當考慮民主的抉擇程序時，我們必須互分①討論的提案及其正當性②對於先前論述與抉擇結果的關係，事實上，除了部分社團對大學政治問題的分析外，大學並非是政策決定的示範場所。但是我相信，如果討論是在基本上屬於理性規範的範疇內，並且它能使科學觀念放出光芒，那麼它是一個適於討論政治爭論的場所。

「校園中的學生能否在扮演市民角色時，還認清示威活動與示威前的爭論焦點之間的連繫？」這個論述爲我嘗

試闡明一個在大學知識企業與危機企業其存在的關係，而此連繫亦可藉政治上的自我保護而獲得，當民主思想尚未深植入大眾人心時，我們必須希求偽造過的緊急危機，不被當局視爲對法治社會的挑釁行爲。在這種情況下，唯一能發生作用只有自我防禦系統，基於利益一致，而團結的這個系統，在現實社會中，它是在廣受攻擊的機構所採用的。而某些特殊團體更能在此時促使一般大眾的敏感注意，獲得超越自身能力範圍的力量，以明鏡報（西德第一大報）爲例，整個報社由少數人聯合，爲了言論自由受到干涉而群起聲討，以支援這些人。政府干涉工會工資的自主權，亦會引發集體抗議。同樣的，校園內組織標準的情況下所設立的教學與研究的自由保證，如果一再受到侵犯，首先會起來抵抗的，便是大學本身，而且是教授與學生間的並肩合作，這類自衛反應，在沒有民主的大學校園內，是不可能希望獲得的，如果爲了這個理由，我們不僅允許並且提升校園實際問題的討論，那麼學生自然能獲得更大的權力參與整個學校本身，作爲政治問題的討論，所以他們應當有做爲決定地方或國家關於大學或高等教育的合法角色才是。

過了數年的努力，現在，一群活躍、理性並且有說服力的少數大學生，他們需求校園民主的自由呼聲日益提高。往昔大學在教授治校的情況下，校園被偽裝成一個老師與學生共同組成的社區，現在這些將被法人團體所取代，他們的行政管理將強調學生、年輕教員、教授的個別利益，而學術獨斷與學術行政管理的各自爲政亦將被克服，而學生與年輕教員將依據他們實際的能力，參與學術資源的管理。可是，這些計畫曾被誤導部份原因基於一開始就設計錯誤的模式，在此，我無法更進一步的論述，但我堅信，做爲教授的我們沒有理由仰制自己對這類問題深入研討的意願才是。

如果現今“自由大學”的開放性格與部分報社的悲觀報導背道而馳，並且發生衝突，這並不能傷害大學的獨立生存或者獨立作風，却可能導致在政治上有意義的結果。如：柏林大學與中央合衆大學的聯合委員會的組成，使得此委員會的教授們能夠毫無顧忌的與校方、學生們商談學校政策的需要，包括最嚴重、最敏感的話題，而且大眾能夠馬上獲知任何的結果。

（摘譯自 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
感謝逢甲大學英語電話中心 周主任協譯